

文化中国
天地日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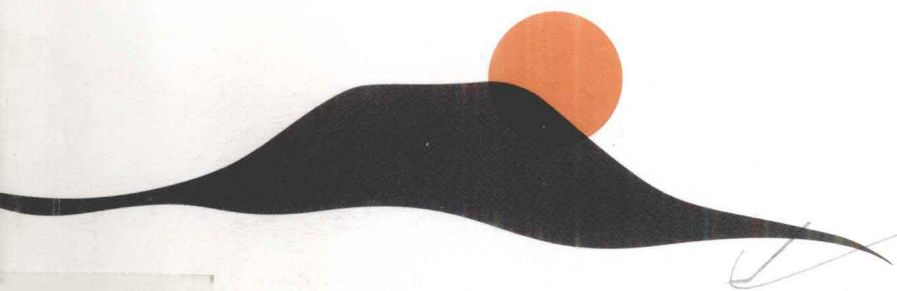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源与流

在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原则下，
历代不同的种族最后都融合在中
华文化的熔炉里。

邢义田

主编



黄山书社

中国文化源与流

邢义田

主编

本书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授权出版发行简体字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源与流 / 邢义田主编.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11 (文化中国丛书)
ISBN 978-7-5461-2264-9

I. ①中… II. ①邢… III. ①中华文化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5784 号

中国文化源与流

邢义田 主编

出版人: 左克诚

责任编辑: 孙晓林 刘翔

责任印制: 李磊 赵彬

装帧设计: 范晔文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邮编: 230071

策划: 香港三联书店北京工作室

发行: 北京时代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电话: 010-6551362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 010-61202350

开本: 710×1050 1/16 印张: 23.75 字数: 338 千字

版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1-2264-9 定价: 48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林载爵

这一套“文化中国”丛书原来是以“中国文化新论”之名，于1982年10月在台湾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总共12册，将近4000页，约400万字。这套丛书讨论了10个主题，包括：文明的根源、思想、文学、科技、制度、经济、学术、社会、艺术、宗教礼俗。以118个题目全面性的讨论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各个层面，组合成一幅比较完整而丰富的中国文化图像。撰写者一共96位，网罗了当时年龄约30到40岁的青年学者，反映了1970年代以来台湾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化的反省与思考，构成了中国文化再诠释的新篇章。这些学者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几乎都位居台湾学术界与文化界的重要位置，当年所发表的论点今天仍然具有新意，可以提供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种视角。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在受到西方文化长期的冲击以及连带对传统文化进行无情的批判之后，好不容易终于体认到传统与现代是连续性的整体，不可分割断绝。因此，一部超越传统的论述，适合于当时处境与需要，又有系统的中国文化史论著，显得十分迫切。其次，中国文化在1970年代的华人世界需要重新被检视，而台湾则是一个恰当的

地方。台湾的学生从小接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在大学又接受了西方式的学术训练，西方汉学家或台湾出身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的历史学者，不断在台湾传播新的观念与思维，他们给台湾学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到1970年代，这样一批受到西方式现代教育熏陶，对传统中国文化又有新见解的年轻学者已经在台湾出现，成为台湾学术界的一股新兴力量，他们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自然有着不同的视野与不同的解释。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将他们集合起来，总体呈现一个全然有别于过去的中国文化的新观点与新解释。

于是，《联合报》的创办人王愷吾先生以他所设立的“文化基金会”资助了这个庞大的出版计划，目的就是要“提供一部丰富新颖、流畅可读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撰述者之所以以年轻一代的学者为主，最重要的原因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呈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三十年台湾文史教育的成果，并且深信年轻一代学者以其所吸收的西方知识、所接受的近代治学方法训练，必能对传统文化提出新的解释观点。

从历史背景来看，1975年是台湾思想发展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林毓生教授首度返台任教，开启了一批想要获得更精密的思想方式的青年学生的视野。他在这一年的5月发表了一篇长文：《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点燃了沉闷气氛下青年学生重探狂飙年代的兴趣，与领会思想问题的不同讨论方式。同年年底，余英时教授发表了《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文章中深入而前所未见的观点，让青年学生发现思想的新世界，这个世界辽阔无边，只要运用理智的思考与分析，加上一些想象力，便可展翅飞翔，一股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开始出现。

隔年，1976年，余英时在《联合报》副刊上陆续发表《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术发微》等文，为当时争论不休的“专制”问题提出了中肯而又有说服力的解释。9月，余英时将上述文章及其他论著结集为《历史与思想》，由联经出版，这是余英时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

不论林毓生或余英时，在讨论问题时都不时引用当代西方学者的观点，对台湾青年学生带来极大的刺激。此后，翻译现代思想名著成为几家出版社的共同职志，知识青年在这方面所表现的求智渴望，是1970年代末期台湾文化界极为突出的现象，这是一个思想燃烧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中，知识青年一方面向西方看，一方面又回望中国传统文化，企图让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受到批判之后赋予新的解释，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中国文化新论”就是这个组合的产物。

这套丛书的编撰过程也有其新颖之处。一般丛书的编撰，惯例上都是汇集单篇论文而成，这一次突破了旧有的方法，从开始就采取了以研究讨论为基础的共同参与方式。自丛书的主题、篇目，各篇间的相互关联，以至各篇文章的论旨，都经过每册作者讨论后才决定。初稿完成时，也经过切磋、问难，然后，再次修改定稿。所以，这套丛书并非过去旧有形式的论文集，而是具有主题、结构的集体创作。

有关文化史的研究，不论通史式的概述或断代式的专论，都不可避免的有其缺失。概述易省略其深奥与意涵，专论易疏忽其源流与发展。这套丛书则采取以问题为主的研究，完全根据问题的性质，或通贯而观，或断代而论。这种研究方式，保留了方法上的极大弹性，同时，也更容易彰显问题本身的性质，提出更周全的解释。以关于文学的两册为例，一册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间情爱的关注、幻想与神话，到智与美的融合，一共设计了六项我们认为能够充分表征中国文学传统的主题，给予系统性的解说，并讨论了文学的形式与意义、抒情精神与抒情传统。另一册则分别就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宋诗、咏怀、咏物、小说、戏剧等重要的文学类别加以论述。两者配合，相信不但突破了旧有的文学史形式，而且更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学史的内容。有关学术的一册，问题的选定则侧重每个时期的不同成就，从学术的萌芽到经学、注疏、理学、考据学，一一论列，以见学术的发展。关于制度与艺术的卷册则又注重各个不同的部分或类别。制度的一册里讨论了皇帝、宰相、监察、选举、考试、史官、地方行政、君主教育等官僚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并申述中国政治

制度的特色与历代政治改革的理想。关于艺术一册的内容包括了美学思想、青铜、玉器、陶瓷、雕塑、书法、绘画、文人生活工艺品、建筑等重要部分。

这套丛书既然是以问题为主的研究，自然而然，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一则反映了年轻一代学者的主要关心所在，一则想透过新问题表达新的解释观点。以关于思想的两册为例，讨论了忠、孝、仁、礼、公、私、仕、隐、常、变等传统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并作了新的阐释；同时也提出了理想人格、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德治与法治、儒家政治理想、法理依据、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均富理想、管制与放任、道德自主与社会约束、道德与政治、自然秩序与人文秩序、自然观念等新问题，赋予传统思想新的意义。借着尝试提出新解释，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更能显现出来。

然而，新的解释观点并非凭空杜撰而来，在这一点上，这套丛书特别强调广泛利用前辈学者的杰出研究成果，以此为根基，再作进一步的发挥。因此，钱穆、萧公权、李济、徐复观、牟宗三、杨联陞、屈万里、全汉昇、刘若愚、陈世骧、李剑农、赵冈、劳榦、张光直、余英时等等许多前辈学者的优异著作，都随时被年轻一代的学者所征引。这种现象除了说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受到年轻一代学者的绝对肯定与尊敬外，更表示了处于变动之中的中国近代学术生命，在台湾的一脉相传，其意义自是无限深远。

尽管当时两岸隔绝，但各篇文章中，凡是论及根源，都运用了最新的地下考古材料来印证解说，根据最新的地下出土文物，分别从居址、器物、食粮、国家等方面，完整而清晰地描绘了八千年前开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我们对先民活动起居的情形、食米（小米、稻米）吃肉（以猪为主的家畜饲养）的文明、上古社会形态的变迁、国家组织的出现，也就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特别是提出“满天星斗”的上古文明的多元发展史观，更是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样性的了解。其他诸如讨论到地理环境、原始艺术、原始宗教、人文思想、天下观念等问题的文章，也都能参证地下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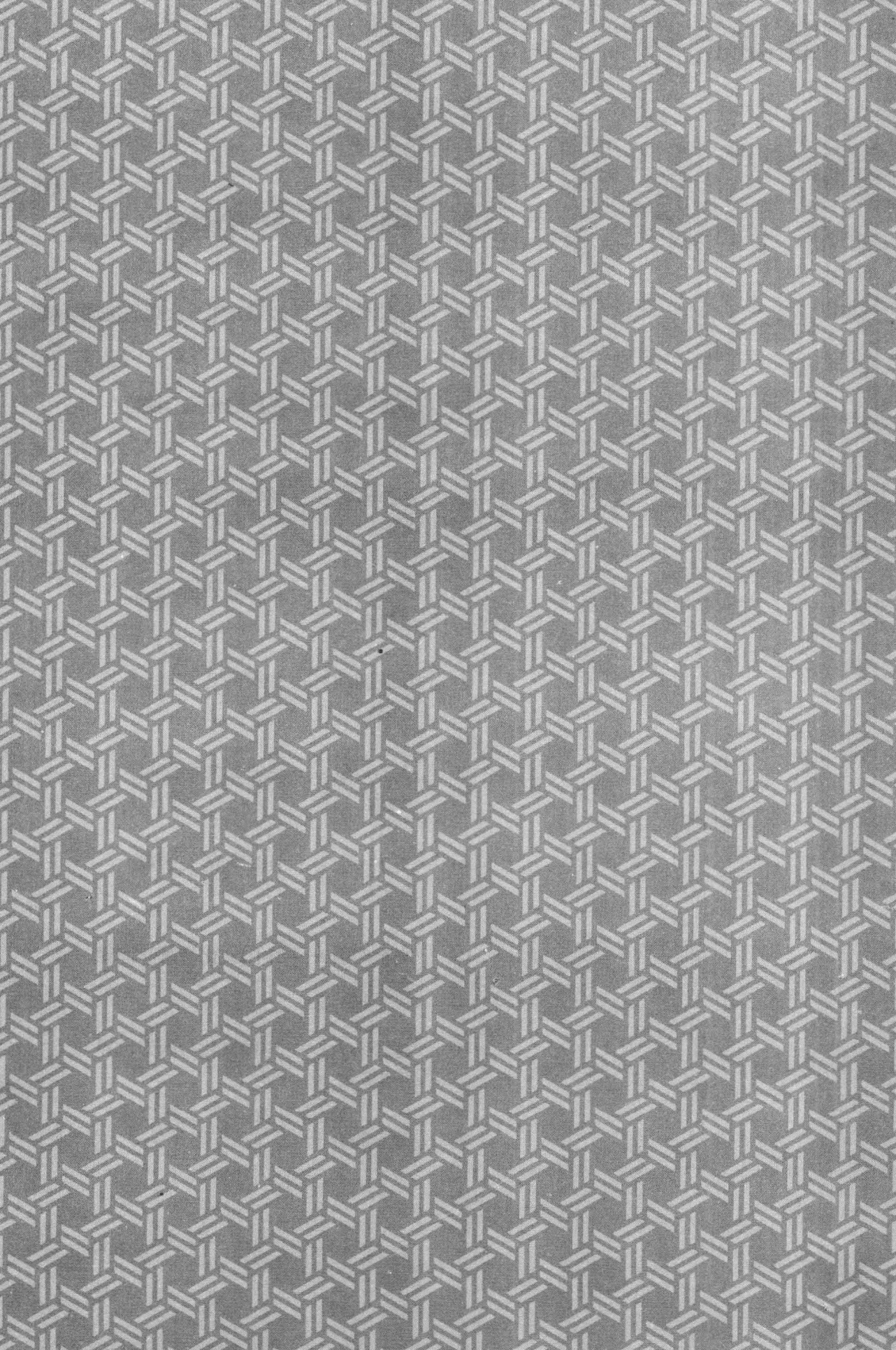
这套丛书自始即希望能涵盖较为广阔的文化活动层面。不可否认，近代历史教育过于偏重政治史，这使得历史教育的文化内涵，显得极其贫乏。这套丛书除了具备广为熟知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制度之外，更包含了以往较受忽视的社会、经济、科技、宗教、礼俗等层面。过去，对于中国科技史的了解，总是借助于英国李约瑟或日本薮内清的著作，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本与科技有关的专著，这也代表着年轻一代的科技史研究者踏出了一大步。在台湾，经济史是当时的一门新兴学问，年轻一代投入这项研究工作的，愈来愈多，相关经济的这本便是这些研究者所展现的成绩，分别从农业的自然环境、农业水利、新耕地的开发、土地分配、生产技术、商业、城市、货币信用、交通、海外贸易、财政税务等十一个方面，建构一部经济发展史。关于传统宗教，也选择了几个重要的问题来讨论。特别要一提的是风尚礼俗。近代以来，在对传统进行批判时，礼俗必定首当其冲，自命新派者，即清末所谓的“文明人”，弃之如敝履。然而，这套丛书中关于礼俗的则本着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探讨了祭祀之仪、婚丧之礼、长幼之伦、以及民间节庆、娱乐的文化意义，赋予这些传统礼俗一个新的文化生命，纳入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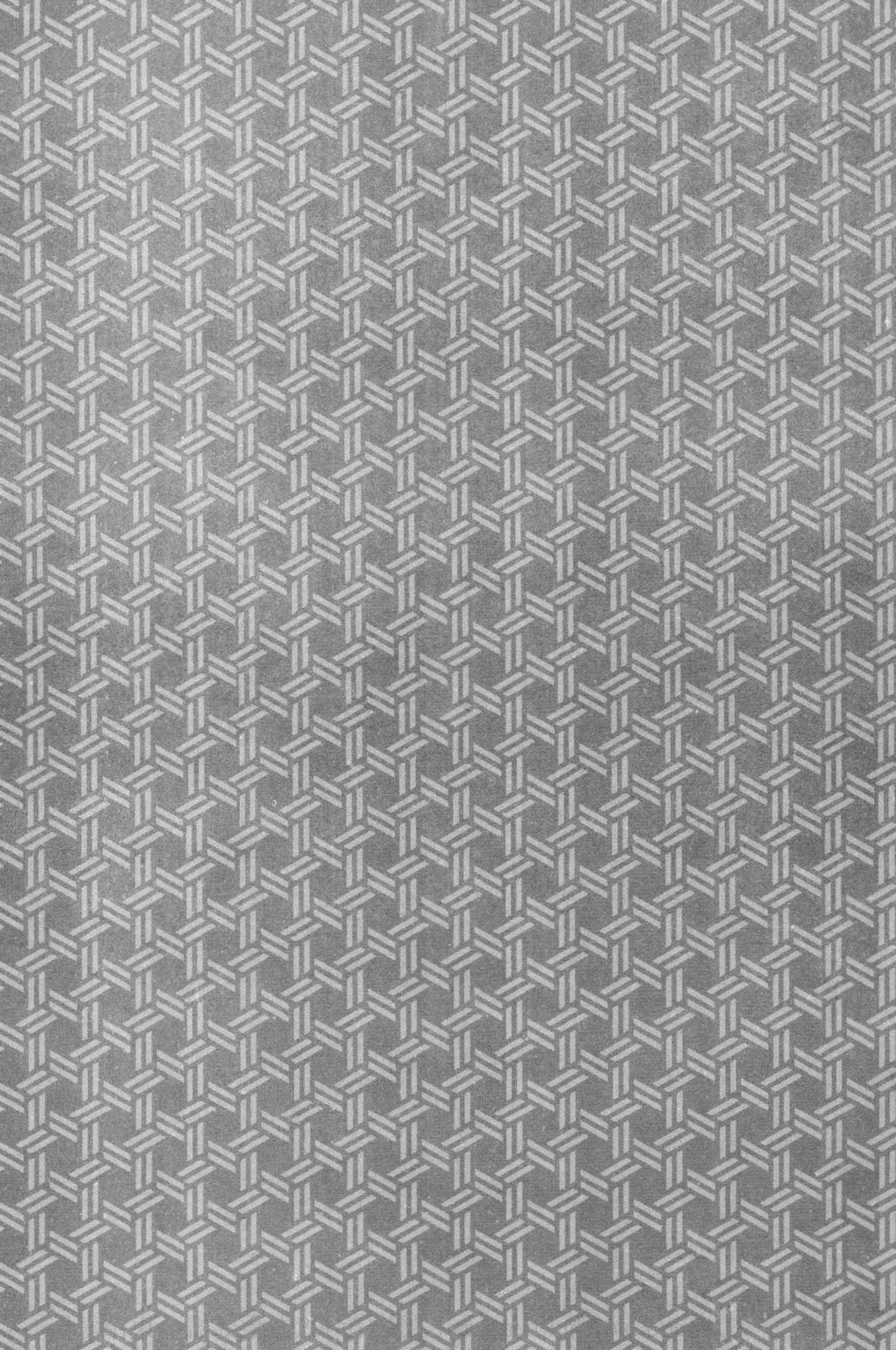
在简述这套丛书的编撰过程与内容特色后，作为当年的执行编辑，我非常高兴这套丛书在李安小姐的主持之下，以新的面目重新出版，期待书中的观点能够对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有所助益。

2011年11月

目 录

| | |
|-----|----------------------|
| i | 总 序 |
| | 林载爵 |
| — | |
| 4 | 导 言 |
| | 邢义田 |
| — | |
| 10 | 筚路蓝缕 —— 从村落到国家 |
| | 杜正胜 |
| — | |
| 54 | 山河岁月 —— 疆域开拓与文化的地理环境 |
| | 刘超骅 |
| — | |
| 86 | 万民归宗 —— 民族的构成与融合 |
| | 蔡学海 |
| — | |
| 118 | 心声心画 —— 语言和文字 |
| | 黄沛荣 |
| — | |
| 160 | 梦与真实 —— 古代的神话 |
| | 王孝廉 |
| — | |
| 198 | 繁花初绽 —— 史前的艺术 |
| | 刘良佑 |
| — | |
| 250 | 人的自觉 —— 人文思想的兴起 |
| | 林载爵 |
| — | |
| 284 | 天下一家 —— 中国人的天下观 |
| | 邢义田 |
| — | |
| 316 | 光被四表 —— 中国文化与东亚世界 |
| | 高明士 |
| — | |
| 344 | 有容乃大 —— 中国文化与西方世界 |
| | 张永堂 |
| — | |
| 366 | 作者简介 |





导言

邢义田

中国文化有如千里不绝的长江、黄河水。溯其发源，乃是无数支脉；观其流布，则是百川汇聚，万流归宗。古人说：“江河不捐细流，乃能成其大。”这岂不正是中国文化源起与拓展的写照？东流的江河，千年如一日；绵延的华夏，亦以千岁为春秋。千岁之中，忧患与安乐相承，太平与战乱相因，不也正如江水随境遇而化，时则温柔无限，忽又骇浪惊涛？唯其蜿蜒变化，才见长江、黄河之美；亦唯其兴衰起伏，始证中华文化的坚忍与博大。

长久以来，华夏的子孙一直以拥有浩瀚的江河而自负，亦以优越的文化而自傲，奈何水行千里，有时而弱，中国近世，亦呈老大。西潮东来，竟激起“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变局之下，国人张皇失措，或抱残守缺，一意拒外；或尽失自信，以夷变夏；纷扰混乱如是者，已近一百五十年。此其间非无感时忧国之士，力图挽救，然混沌之局，未见廓清，岂不令人浩叹！

考其因由，非止一端。如从中国文化源起与拓展的经验考察，可得而言者有二。一是文化有如千层宝塔，乃层层堆叠，非累积不能至其高；又如江河之水，乃波波相连，不可断，亦不能断。无奈近世之人惑于传统应付世变之无力，震于西学之当令，以为非尽弃固有，不足以言革新，唯全盘西化，始克求生存。于是硬生生抛却自家无尽藏，于西学做无根之嫁接。二是文化的兴衰每与能否容纳新的成分，接受新的挑战相呼应。此亦如江河之于细流，拒之则成死水，纳之则诸流并进，相激相荡，永保活力。文化的活力在于兼容并包；非此则彼，必然僵化。考之国史，于先秦、于魏晋、于隋唐，思想非一，种族杂沓，而中华文化之丰富灿烂，皆在此时。千载以下，中国文化能否再创新局，端视我们能否纠正自断脐带、漠视历史的错误。唯有重新体认和吸收传统的经验与智慧，使传统与现代衔接，我们才能更上层楼，也唯有记取“有容乃大”的历史教训，我们才能创造充满活力的社会。

基于这样的体认，本卷十篇论文旨在探讨中华文化的根源与拓展。希望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将个人以及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综合地作一论述，作为我们对中国文化再认识的参考。

杜正胜先生的《筚路蓝缕——从村落到国家》，剖析中国文化从八千年前萌芽到四千年前文物灿然大备、城市国家出现的一段历程。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已可推到八千年前。当时中原地区的居民选择近水的台地，经营着以种植黍稷为主的定居农业生活。而六七千年前浙江河姆渡的水稻文化证明中国文化的泉源不止一端。先民血汗，点滴汇聚，生活的形态从原始村落进而为城市聚落。这种演变在时间上大致与传说中盛于制作的黄帝时代相吻合。这一段三代以前的“大同”之世后来竟成为中国人向往的黄金时代。

历史上中国人如何在以黄河、长江为主体的生存空间里，开创文明，拓展疆域，是刘超骅先生《山河岁月——疆域开拓与文化的地理环境》的主题。全篇指出文明创造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凝聚在古人“利用厚生”这句话里。而中华文化疆域的形成、拓展的方向以及许多中国社会、经济、思想、政治上的特质都与这块大地的性质有关。也许因为如此，我们才常以“黄河的儿女”自命吧？

其实构成中华民族的不止是“黄河”的儿女。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里，不知有多少不同的血液，像长江、黄河无数的支流，来自各方，最后汇合交融，形成一道历史文化的巨流。蔡学海先生的《万民归宗——民族的构成与融合》，强调民族意识是我们认识民族形成的关键。而中国的民族意识是以优越的文化意识为基础的。在“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原则下，历代不同的种族最后都融合在中华文化的熔炉里。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是“有容乃大”的最佳见证。

文化的源起与拓展有赖于人群心灵的交流。交流的一个主要媒介就是语言文字，中国的语言很复杂，却有共同的文字。这不但构成中华文化极独特的一面，也奠下它绵延统一数千年最重要的一块基石。黄沛荣先生的《心声心画——语言和文字》，从语言学的角度指出了中国语言和文字的特色，并从一些文化观念、社会生活和文学的例子点出语言文字和文化的关系。

神话代表着一个民族童年的梦与先民对真实的了解。王孝廉先生的《梦与真实——古代的神话》，告诉我们中国并不是一个没有神话的民

族。先民自有他们一套解说自然万事万物的观念。今人不能全然明了，称之为“神话”。王先生举出创世神话、自然神话、帝女神话、四季与五方的神话以及西北大荒诸神为例，显现中国古代神话丰富的内容。

对美的鉴赏是文化一个重要的表征。谈中国文化不能不提艺术。刘良佑先生的《繁花初绽——史前的艺术》主要以陶器为例，刻画出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对色彩、线条、造型高度发展的审美观念。而陶器器形的变化，从仰韶文化时期开始到龙山文化后期，有奇妙的反复现象。至于如何解释，犹待专家学者努力。

与西亚两河流域、埃及以及印度的古典文明相比较，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中国文化里理性的早熟。林载爵先生在《人的自觉——人文思想的兴起》一文里，清楚地指出中国人很早即以理性为基础，超脱宗教，建立以人为本的人间秩序。所谓民为神主，知生事人，这种以人为自身主宰的人文精神萌芽于殷商，成形于周初，而总结于孔子。以孔子为代表的人文思想表现在敬天、德治和爱民的具体主张上，而其终极则在于天人相与。

本卷最后三篇：拙文《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高明士先生的《光被四表——中国文化与东亚世界》和张永堂先生的《有容乃大——中国文化与西方世界》是希望指出，要明了中国文化的凝聚与扩展，眼光不能仅仅限在所谓“中国”的范围之内。从扩展来说，高明士先生清楚划出一个以汉字、儒教、律令、中国化佛教和科技为要素，在地理上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有机的“东亚世界”。中国的文化不仅在东亚造成深远的影响，也流播到西方去。张永堂先生从历史的角度，指出中西文化的交流为时悠久，近代更盛。从凝聚来说，中国文化之博大乃是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质素的结果。近代西方文化的输入，影响更是巨大，一直到今天，如何将中外新旧的文化因子适当地凝聚整合在一起，开出新的文化局面，还是一个大问题。这不免牵涉到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秩序的看法。拙文尝试剖析传统中国天下观念的结构，并指出夷夏之防与天下一家为此观念之两端，理想上从天下一家的观念出发，任何文化无不可兼容并蓄，熔铸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

之内。而现实上，中国有时不免忧惧，企图抵制外来的影响，以维持中国内部的稳定。时移世变，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应如何在自我与其他文化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秩序，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解决的。

